

西南考古文獻

第一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第一卷
第一冊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七輯

西南考古文獻

第一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南考古文献/罗二虎编.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8

(中国西南文献丛书; 7)

ISBN 7—311—02105—7

I. 西... II. 罗... III. 考古—文献—汇编—西南
地区 IV. K87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149号

策划: 高国祥 李民发

责任编辑: 文 实

美术设计: 徐祖蕃

中国西南文献丛书
第七辑·西南考古文献(1—10册)

主编 罗二虎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308号 电话: 8617156 邮编: 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354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插页: 12

字数: 463千字

ISBN7—311—02105—7

定价: ¥3,250.00元

綜 述

羅二虎

中國西南地區考古的出現和發展與中國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并經歷了金石學與近代考古學等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在中國，其考古學的前身是金石學。我們知道，中國古人對古物的興趣愛好可追溯到先秦兩漢時期，并在東漢時期就已提出了『古學』的概念。雖然所謂的『古學』主要是指研究古文字在內的古文經學，但研究古文字本身就已經進入了我們現在考古學研究的範疇。北魏時期，酈道元的《水經注》一書，就對各地區古代的城址、陵墓、碑碣、廟宇等遺跡做了詳略不等的記述。《水經注》中的這類記述對日後中國方志著作中專辟『古跡』門類這一傳統的確立有較大的影響。金石學的誕生是在北宋中葉（十一世紀），當時它的研究對象僅限於古代的『吉金』（青銅彝器）和石刻。宋代從事金石學活動的人也多集中在中原和長江中下游等當時的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宋代金石學

著作所收錄的範圍都是全國性的。不過，宋代的數部具有代表性的金石學著作，如呂大臨的《考古圖》、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王象之的《輿地碑記目》、洪適的《隸釋》和《隸續》等，均涉及到西南地區、尤其是巴蜀地區的金石學材料。

元代時出現了專以某一地區為對象的區域金石學著作，例如色目人葛邏祿乃賢撰的《河朔訪古記》就是專門記錄黃河中下游地區碑刻古跡的金石學著作。

清代，尤其是乾隆時期以來，是金石學發展的鼎盛時期。與此前相比，這一時期的金石學家其鑒別精密、考證詳盡，收錄的範圍、對象也較前擴大。根據容媛所輯《金石書錄目》的統計，在現存的金石學著作中，北宋至乾隆時期以前的七百年間僅有六十七種著作，其中宋代人的為二十二種著作，但是乾隆時期以後的約二百年間却達到九百零六種之多。這一時期專以某一地區為對象的金石學著作、尤其是石刻著作也大量出現，例如畢源的《中州金石記》、《關中金石記》，阮元的《兩浙金石志》，翁方綱的《粵東金石略》等。

專以西南地區為對象的區域金石學著作也是在乾隆時期以後才開始出現的。在乾

嘉學派的影響下，嘉慶道光時期西南地區的金石學發展進入了一個繁榮時期，有較多的金石學著作問世。但進入民國以後，隨着近代考古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與全國其它地區的情況一樣，西南地區的金石學也逐漸衰落。盡管如此，也仍不時有金石學著作問世，并持續到民國末年。通觀西南地區金石學的發展，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一些特點：

第一，西南各地區間金石學的發展參差不齊。這其中以四川（包括重慶）和雲南較為發達。這兩地不但有較好的社會基礎，而且問世的金石學著作也相對較多。貴州和廣西則很少有專門以本地區為對象的金石學著作問世，在西藏地區更是不但未見金石學著作問世，甚至不見本地區有人專門從事這方面的活動和研究。

第二，其金石學收錄、研究的對象以歷代的石刻為主。這主要是因為在西南地區過去較少發現古代的銅器，更不用說是三代的『吉金』（青銅彝器）了。在古代銅器方面，見於著錄的主要是一些東漢時期雲南昭通一帶制作的青銅容器，俗稱『朱提堂狼洗』。與此相反，西南地區保存下來的歷代石刻却數量衆多，在全國的金石學研究中占有相當的地位。因此，在關於這一地區的金石學著作中，多是以石刻材料為主，例如

劉喜海的《金石苑》、謝啓昆的《粵西金石略》、阮福的《滇南古金石錄》、李調元的《蜀碑記補》等。

第三，有關西南地區金石學和古跡的材料和研究還大量保存在各種地方志中。在清代雍正、乾隆時期以前的地方志著作中，『金石』贊不單獨成爲一類，而是散見於古跡、藝文等部分中。但嘉慶時期以後，在西南各地撰修的地方志中，也都先後開始專辟了『金石』一門。例如在嘉慶時纂修的《四川通志》和《廣西通志》中就開始專門撰寫『金石』一門。此外，在道光時期纂修的《雲南通志》中，也開始專門將『金石』列爲一類。在西南地區，關於古跡的記錄出現很早，如元代人郭松年《大理行記》就對大理地區的古跡和古代碑刻有所記述，明代曹學佺的《蜀中名勝記》、徐霞客的《滇游日記》等書更是大量記述了西南地區的歷代古跡。在清代的地方志中，基本上都專門辟有『古跡』（或『勝跡』、『陵墓』、『冢墓』）門類，內容豐富。

今天，金石學雖然已爲近代考古學所取代，但這些衆多的金石學著作仍然能够爲我們現在的考古學研究提供許多有用的資料，金石學的許多研究成果至今仍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由於年代距今很近，清代方志中有關歷代各種古跡的記述，仍然可以爲

我們今天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十分有用的綫索。

二

作為一門近代科學的考古學，是以科學的田野考古發掘為標誌。近代考古學興起於十九世紀中期前後的歐洲，到了二十世紀初在中國也開始出現。中國最初的考古工作主要是由外國學者進行的。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中國學者也開始獨立從事田野考古工作，並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的是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的殷墟連續進行的十五次大規模田野考古發掘，並以發現的大量重要商代遺存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不過應當指出的是，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前，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集中在北方地區。

一九四九年以前，西南地區的田野考古工作與中原地區相比發展較慢。雖然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些外國的傳教士、探險隊和考察團也陸續開展了一些工作，但也主要限於實地考察和對史前遺物的采集。其成果也多在國外發表。這些著作中除了馮承均翻譯色伽蘭的《中國西部考古記》之外，多在當時的國內未產

生很大的影響。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的學者和學術機構聚集西南，真正意義上的西南考古是從這時才開始的。不過，由於戰爭的影響，當時的田野考古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回顧這一時期的西南考古，其大體情況如下。

無論從空間上觀察、還是從時間上觀察，這一時期已進行的考古工作都只是一些散點，而非連接成片，當然更非是全面的。例如從空間上觀察，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四川和雲南兩省以及現重慶市的某些地區，而貴州、廣西和西藏等地除了零星的調查之外，基本上未開展任何田野考古工作。從時間上觀察，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尚未開展，僅在廣西地區進行了零星的洞穴遺址調查。西南史前時期（西南各地區間史前時期的下限都不同）已進行過的考古工作有雲南大理洱海地區史前遺址、四川川西平原的大石遺跡、四川廣漢的『廣漢文化』（現稱『三星堆文化』）、岷江上游地區的石棺葬。傳說和歷史時期已進行過考古工作的有四川戰國至西漢的『巴蜀文化』、四川和重慶的漢代崖墓和磚室墓、雲南昭通的『梁堆』（漢至六朝墓）、雲南大理地區的南詔時期遺址、成都的五代前蜀王建墓、四川南部珙縣的懸棺葬等。

這一時期田野考古工作的水平參差不齊。在當時，主動的田野考古發掘很少，其

主要有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吳金鼎等人受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派遣，在雲南大理洱海地區史前遺址的調查和發掘；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由當時的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聯合組織的『川康古跡考察團』在四川彭山進行的漢代崖墓發掘；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由四川省博物館籌備處的馮漢驥主持發掘的五代前蜀王建墓。這些發掘由於是有計劃、有準備地進行，主持發掘者又都是曾在海外接受過考古學專業學習的專業人員，因此發掘的水平較高。此外，一部分田野考古工作屬於偶然的發現或在調查途中臨時進行的小規模清理試掘，從事這些田野工作的人大多也并非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因此發掘的水平參差不齊。

此外，對這一時期調查和發掘的考古資料的整理發表時間早晚不一。某些調查或發掘考古資料的整理進展很快，例如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吳金鼎等人在雲南大理洱海地區進行的史前遺址調查和發掘，其採用的是邊調查發掘邊整理資料的方法，因此《雲南滄洱境考古報告甲編》和《雲南滄洱境考古報告乙編》於一九四二年就問世了。但是大部分的發掘或調查資料因為戰爭或其它原因，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才陸續發表，例如《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一九六四年）、《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一九七三年）、《四川彭山漢代崖墓》（一九九一年）等。此外還有少量的資料至今仍未見公佈。

在這一時期，隨着近代考古學的引進和新考古資料的陸續發現，利用考古學方法進行西南地區考古與歷史文化研究的著述也開始問世。這類著述可以鄭德坤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專著《四川古代文化史》為代表。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七輯《西南考古文獻》的編輯是在本叢書的總編輯原則指導下進行的。由於本輯《西南考古文獻》只限於十冊，而這一領域的現存文獻又數量衆多，因此在本輯中只能有選擇地編輯收錄其中的部分文獻。選擇的標準是：首先其內容限於主要是關於西南地區的金石學、考古學著作，對於僅少量涉及西南地區內容的文獻在本次編輯中未予收錄；其次是要考慮這些文獻自身在考古學研究中所具有的學術價值；再則是要兼顧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中有代表性的文獻。其目的是使本輯的《西南考古文獻》既能為當代的考古學研究提供現在較難見到的資料，又能在一定程度

上較全面地反映出西南地區一九四九年以前金石學和考古學的整體面貌和發展歷程。

基於上述原則，我們選擇并編輯了二十一種文獻（選自十八種不同的書籍），這其中有的是金石學著作，有的是地方志中的金石和古跡等部分，有的是田野考古報告，有的是學術專著，還有的是學術論文。在這十冊中，前九冊總的來說都是屬於金石學著作，僅第十冊是考古學著作。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九四九年以前西南地區金石學和考古學本身的實際發展狀況。

第一百八十一冊（即《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總流水號，也即本輯第一冊）收錄的《四川古跡志》和《四川金石志》等兩種文獻。

《四川古跡志》是從清代嘉慶《四川通志》的『古跡』部分中輯出，筆者自己再給這部分文獻內容加上新的文獻名。該文獻記述了四川（包括重慶）歷代的各種古跡情況，其體例是按地域（府、縣域）敘述，先分府，在府內再分縣，在同一縣內再逐條敘述每一古跡，正文中簡略記述其時代、性質、地望等，然後再摘錄前人等的有關記述。

《四川金石志》是從嘉慶《四川通志》的『金石』部分中輯出，筆者自己再給這部

分文獻內容加上新的文獻名。該文獻記述了四川（包括重慶）歷代的各種金石資料，但基本都是石刻，只是在最後部分附有『器物譜』。其體例是按地域（府、縣域）敘述，先分府，在府內再分縣，在同一縣內再逐條敘述每一金石材料，記述其時代、性質、地望等，并摘錄前人等的有關記述。

第一百八十二至一百八十四冊（即《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總流水號，也即本輯第二至四冊）收錄的是清代劉喜海的《金石苑》。這部書是關於四川和重慶地區的主要金石學著作，劉喜海本人也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學家。《金石苑》成書於清代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約於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刊刻。該書是清代個人收錄巴蜀地區金石材料最多的一部著作。收錄的時間範圍是漢代至宋代。體例是以時代分類，在同一時代的材料中又按地區分類。每條材料是先錄或摹寫原文，然後再加上自己的跋語。全書共分六卷。第一卷為漢代，主要收錄的是碑闕石刻文字；第二卷為北周至隋唐五代，其主要收錄的是碑記石刻文字，其資料涉及的範圍很廣，其中不乏也有大量與佛教和道教相關的內容。第三至六卷為宋代，主要收錄的是各種石刻文字，此外也有少量的鐵器等上面的銘文。其資料涉及的內容更加廣泛，是研究巴蜀地區宋

代社會十分重要的資料。

第一百八十五冊（即《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總流水號，也即本輯第五冊）收錄的是《蜀碑記補》（包括《蜀碑記》）和《貴州金石志》等兩種文獻。

『金華本』的《蜀碑記補》不但有清代李調元的《蜀碑記補》，而且還將宋代王象之的《蜀碑記》包括其中，並收錄清人胡鳳丹纂輯的《蜀輿地碑記目辨僞考異》、《蜀碑記辨僞考異》等兩種辨僞考異。

《貴州金石志》是筆者從民國《貴州通志》的『金石志』部分輯出並編輯成書，再加上新的文獻名。共四卷，收錄了從上古至清代的各種金石材料，有的還附有對此物的考證。體例是按照時代先後排列。

第一百八十六冊（即《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總流水號，也即本輯第六冊）收錄的是《貴州古跡志》、《貴州古跡碑銘志》、《滇南古金石錄》、《滇東金石記》（附《西樓續編》）和《昭通漢金石》等五種文獻。

《貴州古跡志》是筆者從民國《貴州通志》『古跡志』部分輯出，並加上了新的文獻名。該文獻記述了貴州歷代的各種古跡情況，其體例是按地域（府域）劃分，在同

一府內再逐條敘述該古跡的地望、性質和時代等，並註明材料來源。

《貴州古跡碑銘志》是筆者從清代乾隆《貴州通志》的『古跡、邱墓、城池、碑記』等部分（卷七至八、卷四十一至四十二）輯出並編輯而成，並加上了新的文獻名。卷七記述了清代乾隆以前人們所知貴州歷代冢墓、城池等各種古跡的情況，其體例是按地域（府域）劃分，在同一府內再逐條敘述該古跡的性質、地望和時代等。卷八記載的是清代的城池情況，其體例是按地域（府域）劃分，在同一府內按府、縣逐條敘述該城池的地望、沿革、規模等情況。卷四十一至四十二收錄的是貴州地區元代至清代乾隆以前的碑文，體例是按時代先後排列。

清代阮福的《滇南古金石錄》主要收錄的為雲南中南部地區的南北朝至唐代的石刻、鐵器銘文、銅器銘文和磚銘等金石學資料，並且都是全文收錄，在正文的後面附有他人和阮福自己撰寫的跋和案。這是研究滇中南部地區南北朝至唐代金石學方面的要著作。

張希魯的《滇東金石記》主要收錄的是記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雲南東北部昭通地區梁堆（漢晉墓葬）中發現的漢代遺物及其作者張希魯等人的相關考證研究撰文，

但這些漢代的遺物基本都是散留在民間的而非是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附在《滇東金石記》一書後，後面的《西樓續編》也是張希魯編撰的著作，除了收錄了一篇是袁丕鈞撰寫的《跋豆沙關唐袁滋摩崖》之外，都為張希魯本人所撰寫。該文獻收錄的內容較廣，除了涉及到昭通發現的一些漢代銘文銅器、花紋磚等古物和唐袁滋摩崖之外，還有一些其它的非金石學內容。

張希魯撰的《昭通漢金石》主要收錄的是張希魯關於雲南昭通梁堆出土的東漢青銅器和建初時期的畫像石刻方面的兩篇考證文章。這三本著作反映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滇東地區金石學方面的最新成果。

第一百八十七冊（即《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總流水號，也即本輯第七冊）收錄的是《續雲南古跡志稿》、《續雲南金石志稿》、《雲南金石目略初稿》等三種有關雲南地區的金石學文獻。

《續雲南古跡志稿》是筆者從清代光緒《續雲南通志稿》的卷一百九十至一百九十二的『冢墓、古跡』等部分輯出并編輯而成，并加上了新的文獻名。主要記述了清代光緒年間以前人們所知的雲南地區歷代冢墓、古跡等情況，其體例是按地域（縣域）

劃分，在同一縣內再逐條敘述該冢墓或古跡的性質、時代、地望和資料來源等情況。這些資料可以為現代考古學的田野調查提供有益的綫索。

《續雲南金石志稿》是筆者從清代光緒《續雲南通志稿》的卷一百七十一、一百七十二、一百八十六的『金石』以及『碑文、墓表、墓志』等部分中輯出并編輯而成，并加上了新的文獻名。收錄了清代光緒年間以前雲南地區發現的從漢代至清代的金石學資料。該書的體例依各類而略有差異，但大體都是按時代先後編排，每一條首先是記載古物名稱，然後記載正文（石刻碑銘等），最後對該古物的描述、考證、資料來源等情況進行簡略記錄。

李根源編的《雲南金石目略初稿》一書於一九三五年刊行。全書共分四卷，收錄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雲南地區發現的從漢代至中華民國時期的金石學資料目錄。該書的體例是按時代先後編排，每一條首先是記載古物名稱，然後還對該古物的大小、年代、發現地點、資料來源等情況也進行了簡略記錄。

第一百八十八冊（即《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總流水號，也即本輯第八冊）僅收錄了謝啓昆撰的《粵西金石略》一種文獻。這一文獻是從清代嘉慶《廣西通志》的『金